

书海一瓢

高耸的阴影之下——关于戴冰的《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

□杨勇

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这座后来作家们难以逾越的山峰，高耸之下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无疑，博尔赫斯作为写作的暗道和源泉之一，他影响了文坛上众多后来者。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博尔赫斯就是一面镜子，他复制了身后众多的“博尔赫斯”们。后来的作家们对博尔赫斯的膜拜，使博尔赫斯亦成了一座迷宫，写作殿堂中幽暗深邃的迷宫。

博尔赫斯成为博尔赫斯以来，作家们都谈博尔赫斯。然而，无论小说家和诗人，对其神秘写作世界迷雾的驱散，却少有人做得更好。我想，这里有景仰之缘故，但更多却是思想和目力的不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小说，受惠于博氏之余，有见地的谈论博氏深处写作秘密的文章和书籍稀少。失语状态下，对博尔赫斯文本摹写的趋之若鹜和其文本的剖析寥寥无几同样令人尴尬。

戴冰所著新书《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或许出版得晚些，但其“解析”博氏的“野心”居然在15年前就确立了。在这部学术性颇

强的书中，通过对《阿莱夫》《永生》《圆形废墟》《小径分岔的花园》《门槛旁边的人》《死亡与指南针》《叛徒和英雄的主题》《蓝虎》《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吉珂德的部分魔术》《沙之书》《两位国王和两个迷宫》等12名篇的描述、引证、解读、阐释。博尔赫斯特有的模糊的、不确定性的、充满玄学色彩的写作风格和幽深博大的精神世界清晰地显现出了冰山一角或者全貌，博氏的时间观、空间观、生死观、生命观、因果律以及终极不可得性都得到了说服力极强的揭示。

阐释博尔赫斯写作的秘密，这种评价性的写作是危险而又有雄心的，戴冰挑战博尔赫斯就是在挑战自己。凭借多年来的潜心研读和探究似的解读，戴冰在这部书中试图把强大的博尔赫斯从混沌的云端拉下来，摘下他的写作面具，让我们一看博氏之究竟。书中充满灵性的、思辨的文字，引领我们攀爬高峰，照亮了我们的观察盲区，呈现了博氏写作的妙处和绝招。

难能可贵的是，戴冰不只是博尔赫斯写

作与思想的评论者，而且也是践行者。书中每三篇论博尔赫斯文章之后，皆附有他向博尔赫斯致敬的小说文本，《枝蔓》《倾城》《弑》《大教堂》，这些比博尔赫斯还博尔赫斯的实践性小说，也如四面镜子，映照着博尔赫斯。这4篇虚构的文本里，充满意外、玄疑和哲思，皆是可让人反复阅读和品味博氏风格的佳品。如果博氏还活着，他阅读到这些小说文本，不知将做何感想？

《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是很精到的研究博氏的评论性书籍。正是如此，按博尔赫斯的“宿命论”，《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一书也将以“阿莱夫”的方式，或者说“没有一面镜子能反映我”的方式受到“处罚”，也就是说，这部书肯定要迎接博尔赫斯迷们百般挑剔的目光和挑战。

在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当下，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的意义愈发凸显。博氏对世界的形而上的思考，通过小说、散文和诗歌的方式完成于其中，其对世界不可知论、不确定性、无序性、时空复杂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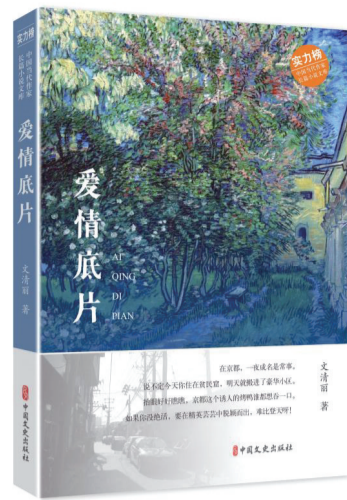
重性、生命无常性的思考，都逾越了过去的时限而直指当下和未来人类处境。博尔赫斯处理的是人类永远要解决而又悬而未决的写作母题。

写作，并不是先来者的世界，他们只是选择了一条可能性的写作道路。《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提供了一条极致的写作道路，实际上也为我们堵死了一条通向博尔赫斯的写作暗道。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谈到了后来的强者作家的处境和姿态：影响的焦虑是存在的，但强者作家却应有弑父情结。从这个角度上说，博尔赫斯的意义就是最终成为写作中的无意义，他消失在后来者众多的写作之中而无丝毫痕迹，这就是最大的意义。

超越，是强者作家（后来者）的姿态。戴冰的《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悄然间在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让写作者找到远离博尔赫斯原本自身的明亮区域，那将是另一座山峰或者另一个风光独特的幽谷。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高研班学员）

桃李天下



文清丽

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届、第二十八届高研班（深造班）学员，其长篇小说《爱情底片》近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描写了上世纪90年代末大学校园生活，小说抓住了工作后重上大学的这批人的精神气息，行文浪漫，让读者感到每个文字都落在实处。文本采用书信、日记、会议记录等形式，颇有实验意味。作者以诚恳之笔，不预设立场作道德判断，而以体恤之心，珍爱笔下每个人物。

译者的表决权在笔端，更在彼端

□赵彦岑

下文基于一个设想，如果要为文学经典投上神圣的一票，译者该如何行使自己的表决权？

借用一本经典情境热场。罗兰·巴特借《恋人絮语》临摹爱情的情境，也可以说借语言触摸爱情的现象，“言语是一层表皮：我用我自己的语言去蹭对方，就好像我用辞令取代了手指，或者说我在辞令上安上了手指。我的言语因强烈的欲望而战栗。骚动来自双重的触摸：一方面，整个表述行为谨慎而又间接地揭示出那惟一的所指，即‘我要得到你’，将所指解放出来，供养它，让它节外生枝，让它爆炸（言语在自我抚摸中得到快感）；另一方面，我用我自己的辞藻将对对方裹住，抚摸他/她，轻轻地触碰他/她；我沉溺于这样的轻抚，竭尽全力延续这类对恋爱关系的议论”。罗兰·巴特不对爱下定义，将爱当作现象细致地描述，这恰好体现了文学性的本质——修辞。其实巴特大可套用2000多年前色诺芬的名句：

既无人明白，也无人知道，
我所说的关于神和一切东西是什么，
因为纵使有人碰巧说出最完备的真理，
他也不会知道。
对于一切，所创造出来的只是意见。
巴特完全可以这么说：
“既无人明白，也无人知道，
我所说的关于爱的一切关于爱的是什么，
因为纵使有人碰巧说出最完备的真理，
他也不会知道。
对于爱，所创造出来的只是关于爱的意见。

修辞作为文学性的根本，导致了复杂的多义性，因而区别了文学与哲学。当然，巴特也说“无时不在的我只有通过总是不在的你的对峙才显出意义”，进一步解释修辞的效果：对峙及张力。
我们再看《恋人絮语》描绘的一个情境：“等待”。妓女要求求爱的名士在她花园

中坐等100个通宵并承诺托付终身。等到第99个夜晚，风流名士最终离去。无关结果的等待出人意料之浪漫，伟大的作家懂懂等待，等待作品的修辞。

《恋人絮语》这一书名已经道出修辞的后劲：飞絮般不可捉摸。经典不衰，恰在于这不可捉摸又盘桓不去的后劲。这“不可捉摸”，换作文学意象，便是法国作家帕斯卡·吉尼亚尔笔下《游荡的影子》，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幻影书》，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漫游者寄宿所》；这“不可捉摸”，描绘了文学的共同体：不可见的家——流浪的真理；这“不可捉摸”，换作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的表述，便是一切经典不可或缺的陌生性。

当然，我们在热切地谈论一部经典时免不了踟躇与困惑，因为经典的修辞必然陌生又多义，因为僭越了既定的权威。而“僭越”本身便是一种权力的制衡，这意味着语言从本质上决定了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的政治性，如果政治如“战后统治了法国智识圈”的科耶夫所说，是为博得肯定而不断地斗争。

如果翻译也是一种政治，译者有且只有一个共同体：修辞的陌生与多义。译者有且只有一个任务：为修辞的陌生与多义不断地斗争，借对话打破权威的统治。当经典的散播需要翻译的介入，多义翻信，权力的斗争翻倍。斯皮瓦克提出“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翻译正朝文化转向，意味着翻译不再局限于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权力问题——文本的翻译，扩展至两种文化的权力问题——文本的选择与阐释。

我们常说“翻译是一种创作”，以创造生命为喻，如果一个译者彻底让出文本选择与文本阐释的权力，无法完整参与翻译全过程的译者局限于文本的翻译，无法纵观全局自然无法从现象出发理解并开放对话，耽于个体的志趣、情绪的发泄，最终反

而淹没于市场与批评的喧嚣，自我封闭的同时牵连无辜的原文，无异于无心生养的代孕孕妈，仅作为一个“载客”的交通工具，免不了为伦理非议。

外国文学的翻译要走向经典，首先要保证翻译的有效性，要求译者完整且持续地参与翻译的全过程——翻译的起点并非文本的翻译，始于文本的选择，借由文本的阐释继续，借此捍卫修辞的陌生与多义。第一，译者应有文学批评的自觉，树立清晰的文学史观，选择经典文本；第二，译者应不断地成为原文最亲密的朋友，避免翻译的“殖民主义”——自以为是地偏离原文修辞，要传达原文的异质性，耐心地往返于原文；第三，译者应以作家的姿态与原文对话，摒弃自我抒情的自恋风气，专注于原文的文学阐释，形成互文以繁殖其多义性。

经典从本质上要求译者做到以上三点，同时也赋予其权力。但实际上，能够做到以上三点的译者少之又少。即便以上世纪80年代的翻译大潮为例，从文本的选择、文本的翻译到文本的阐释均为当时的出版发行主体主导——挂靠体制的美学及哲学学者团体，而非文本最亲密的读者——译者。翻译的黄金时代，因而更多地指向精神的启蒙：比如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以及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最有可能近距离捕捉原文多义性的译者并未参与文本的选择与文本的阐释，无法守护原文的文学性，实际上减损了经典性。

文学经典的陌生与多义是脆弱的，需要译者完整地参与译介的三个阶段，持续且谨慎地守护。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同样地，对于翻译——双文本、双文化的对话活动，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不同品类的书籍、不同版本的译文、不同走向的阐释都在喧嚣中骚动，急需

像傅雷一样全程参与并能在客观限制下协调好各阶段的译者。

毋庸置疑，傅雷的译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我们着重看长期遭忽视的前后两阶段，即文本的选择与文本的阐释。应该说傅雷的前期翻译在文本的选择上有很强的主动性，而1953年公私合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傅雷译者的唯一出版发行主体，文本的选择受到客观制约，傅雷便加强了对文本的阐释，这才有了1981年一经面世便引发轰动效应的《傅雷家书》，而至今仍为大众所传道的傅雷翻译观“重神似不重形似”正出自偏重文本阐释的1951年，《高老头》重译译序。如果傅雷没有主动地选择“巨人三传”、《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傅雷没有进行文本阐释，没有《傅雷家书》，至少可以说，我们无法清晰地看见法国文学翻译走向经典的路径。

如果翻译也属于权力的斡旋，如果需要为文学经典投上神圣的一票，那么译者的表决权，有且只能在笔端，通过文字以文学的表达来实现。

从色诺芬尼、苏格拉底到蒙田、伏尔泰、莱辛再到波普尔，当我们说及知识分子的宽容，谈论的并非出于怠惰或逃避的不作为，而是出于对多义的维护，以写作的方式参与异质性的对话，借此探求经典性更多的可能。

在边界不断融合的当下，翻译如许钧先生所说，并非简单的语言转化，翻译必须表明文化的立场、文化的视野与文化的追求。经典的选择本身就是一场权力的斡旋，如果权威喧嚣遮蔽了文本的多义性，译者有义务借文字文学地行使自己的表决权，繁殖经典的多义性。一个译者，他/她的表决权在笔端，更在彼端——文本翻译外的另一端：文本的选择与文本的阐释。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五届高研班学员）

东庄西苑

银杏果黄色渐深

池塘里的水，有些黄绿。风乍起，吹皱一池秋水。

有红色的、白色的鲤鱼在游动。有一条的，有两条的，有一群的。有一大条的突然拨动水面，画出一个涟漪。

水中央是荷花，花朵不见，被莲蓬取代了。一半是青色，一半已转褐色。依然亭亭，虽然有几片叶子已呈枯黄。

有树叶一片落下来，无声无息。几个孩子的笑声传来。

“老爸，来看鱼啊！”一个小女孩大声喊着。

原来他们一家人，带着食物来喂鱼呢。刚一撒下，鱼就迅速聚拢过来，似乎一塘的鱼儿全都过来了，早早就有了默契。喂，还有两条顽皮地在荷叶下嬉戏呢。

岸边的树不同品种，最容易认得的是柳树。池塘与柳树是最佳搭配了。一株柳树，几枝自上而下，垂下万条绿丝绦，其意境已出。这方池塘，圆中带弧度。虽然有人工的匠心，却也不乏市里的静谧。坐久了，突然闻到幽香，混合着泥土的味道。

喇叭花，小时候故乡叫打碗花的，几朵攀附着，紫色的绽放。这是人为种植的，还是野生的？还是哪只鸟儿衔来的种子。还有一棵桑树，春天会结满紫红的桑果吗？

这是朱自清的另一个荷塘。他就坐在东南的树下，雕像前，是大理石雕刻的荷花。一次次推门进文学馆，放进巴金老人的手模里，他的手紧握住我，“如竹苞矣，如松茂矣”，高山仰止的大师前辈们在看我，鼓励着我。

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叶圣陶、沈从文、艾青、丁玲、赵树理等先生们在园子里的树下，慈祥地看着我们这些文学小字辈。蕙

质兰心的冰心在西南的树下，青春永驻、玉壶冰心。这里还是她与先生的墓地。篮球场就在旁边，似乎有些热闹，她一生赤子之心，她爱所有的孩子们。“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墓地的白玉花瓶里鲜花盛开，我在心里默念也要躬身敬献一束玫瑰，那是她最爱的花。

早晨，鱼儿不急不慢地游走。我一直不敢确认夜晚它们是不是与我一样也要入睡？

耳边听到布谷鸟的鸣叫，今年自己出了新的诗集，名字就叫《城里的布谷》。每到一座城市，不管是春夏秋冬，都能听到这熟悉的叫声，一下子把自己扯回春天的故乡。“阿公阿婆，割麦种禾”，布谷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提醒。如今，它们在城里，在院子里，在提醒谁？提醒什么呢？只是不知它们是何样子，在哪棵树上栖身？

燕垒空梁画壁寒，诸天风雨散幽关。篆香清梵有无间。蛺蝶乍从帘影度，樱桃半是鸟衔残。此时相对一忘言。

——纳兰性德《浣溪沙·大觉寺》

遥想冰心伉俪二人坐在银杏树下，仰望明月。寂静的古寺，只有屋脊上乱跳的小松鼠跑来跑去，仿佛这里只有他们二人。西山的夜如此静谧……

冰心和吴文藻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56年的恩爱夫妻。冰心在80岁高龄的时候风趣地讲述了那时别出心裁以西山古刹作洞房的经过，何等诗意盎然。由于新房还没有完工，冰心与吴文藻把婚礼选定在西山大觉寺里举行，认为这里清静、浪漫。洞房中只有一张简陋的木床，一张三条腿的方桌，另一条腿还是用砖头支撑着。在这简陋的禅房中，他们度过了新婚之夜。

大觉寺始建于辽代，寺内有千年银杏树，有300年的玉兰树，寺内还保留了乾隆的一块真迹“动静等观”匾，它昭示给我们，运动与静止该如何去等量齐观？

还有一块匾——“无去来处”。无去来处，此刻似乎真忘了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将往哪里去。

千年一回着浓妆，深秋古寺吐金黄。

那个下午，我于银杏最好的时候匆匆独自赶来。置身寺中，夕阳洒下万道金光，银杏叶子全部镀了金。站在银杏树下，一只大喜鹊低空飞行，在林间轻盈滑过，技术娴熟，无比优美。黑的尾巴，白色的腹部，灵动的风景，吉祥的画面。另一只喜鹊轻盈地从一株海棠顶上飞起，落在玉兰树上。

满城秋色懂人味，嫣然眼前红于花。外面有乡民卖炒银杏果子和黑枣，10块、20块一斤，先尝再买，不好吃不要钱。勤劳的她们，对自己产品的自信溢于言表……

仰头向上，鸟巢在高高的毛白杨树、银杏树上，不过，不用担心，应该没有孩子爬上树去掏鸟蛋了。我想起故乡村庄的喜鹊窝，树不在，鸟儿也飞走了，眼前的会是它们的后代吗？

在鲁院不远的西北方向，相隔咫尺之遥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公园大门敞开，迎接四方游客。有早起晨练的市民，太极、跳舞、唱歌、读书，还有捡拾熟透了跌落的银杏果的老人，在山水间愉悦身心。穿红衣的阿姨倚靠木桥栏杆，一个大叔耐心地给她拍照，甜蜜无比。

坐在阳光下、背风的山坡上，深秋的北京城在阳光的沐浴下，千里之外的广州却下

着微冷的雨。有鸟儿在欢快地叽叽喳喳，在枝头跳来跳去。身体被晒得暖和起来，一点点热乎。

千万朵芦花，在湿地里开放。灰白色的穗子摇曳生姿，芦苇叶也枯黄了。远处的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奥运塔高高矗立，层次分明。

有枝条全是红色的树林，有顶端居然是黄色的树，都叫不出名字。光秃秃的枝头还有两个红果子，晶莹剔透，也许鸟儿也不舍得啄食它们，留着做晚归的红灯笼。

水面靠岸边，结了层薄冰。有鸭子几只，湖水初冷鸭先知。它们似乎不怕冷，一会儿把头扎下去，只露出屁股来。过一会儿，又露出头来。我忍不住停下脚步，多么滑稽而可爱啊。

它们是在觅食还是嬉戏呢？黑黝黝的桃树一垄垄，在积蓄能量，准备春天开花。只要温度一够，就是一树繁花。

柳树，叶子微黄了，却没有一丝落下的意愿。谁说柳树柔弱，北京街头的柳树到处是，不像江南的柳树，只挑别池塘和河畔。冬天，它们秀发飘逸，带着金边，别有韵味。

有一群群中学生，穿着运动服，在路口商量着，原来是寻找目标地呢。

在桥边，五个女孩在阳光摆出天真造型，请我为她们定格青春美丽的时光。“谢谢！叔叔。”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从我手中拿过手机。她们笑着闹着。

“是秋游还是冬游？”

“不是，是定向越野。”

“那好嘛，到大自然中去上课。”

“很开心。北京的秋天真美，同学们都喜欢。”她们脸上带着羞涩的红晕……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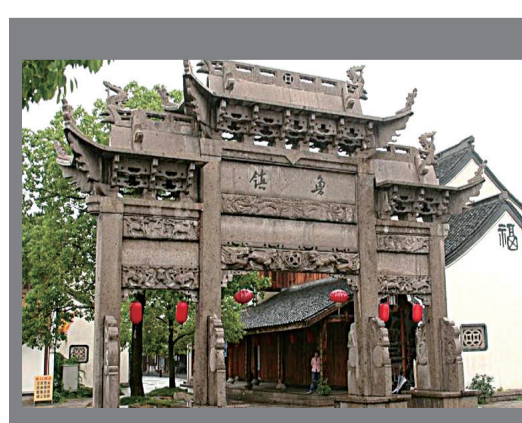
丁利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散文集《我知道》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我知道》是一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相融相济的散文专著，作者从吉林西部起步，深入各地探索自然、人文生态的历史与发展变迁。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交相辉映，文笔流畅而饱含人文关怀，并且有对生态环境的反思。



陈海强

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其散文集《把世界抱进摇篮》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为“结茧的心灵是无畏的”、“在旷野上写作”、“逆光下的地坛”、“我是一块远行的泥土”、“文学从不遮蔽众生的表情”等五辑，收录了作者在不同时期创作的精美散文50余篇，内容涉及童年记忆、成长故事、军旅人生等诸多方面，语言质朴生动。



鲁镇

白描